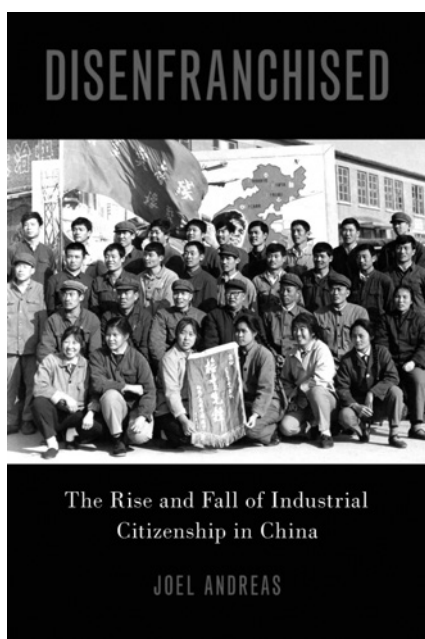


# 西方概念的中國之旅

——評 Joel Andreas, *Disenfranchised: The Rise and Fall of Industrial Citizenship in China*

● 柯孜凝、董國強



Joel Andreas, *Disenfranchised: The Rise and Fall of Industrial Citizenship in Chin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安舟 (Joel Andreas) 是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社會學教授，也是美國

「新左派」代表人物之一。他長期致力於當代中國研究，其《紅色工程師的崛起：清華大學與中國技術官僚階級的起源》(*Rise of the Red Engineer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Origins of China's New Class*) 一書於2009年出版後，在西方學界享有廣泛的聲譽，並在2017年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推出中文版<sup>①</sup>。《得而復失：中國產業公民身份的興衰》(*Disenfranchised: The Rise and Fall of Industrial Citizenship in China*，以下簡稱《得而復失》，引用只註頁碼) 是他關於中國研究的最新力作，獲得了2021年美國亞洲研究協會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頒發的「列文森獎」(Joseph Levenson Prize)。評審委員會在推薦語中寫道，「安舟追溯了毛時代結束前數十年間，工人為了取得對勞動者及其工作場所的部分控制而展開鬥爭的宏偉故事。……通過對口述和檔案資料的巧妙運用，安舟結合豐富的細節講述了一個得而復

《得而復失：中國產業公民身份的興衰》是安舟關於中國研究的最新力作，作為《紅色工程師的崛起》一書的姊妹篇，本書的問題意識依舊源於安舟對二十世紀社會主義國家消除階級差異的行動為甚麼會遭遇失敗的思考。

安舟結合當代中國「單位」制度的興衰，並藉此對一度頗受追捧的「雙重轉型論」提出質疑和挑戰。他強調市場化改革並不必然促成民主化，因為市場化改革從根本上摧毀了「產業公民身份」和「自主權」，而這兩者都是實現「工廠民主」的必要條件。

失的故事——產業工人政治形象之提升與崩塌，這個故事與中國和全球的現實狀況產生了深刻的共鳴」②。由此可見，西方學界對本書的高度肯定。

作為《紅色工程師的崛起》一書的姊妹篇，本書的問題意識依舊源於安舟對二十世紀社會主義國家消除階級差異的行動為甚麼會遭遇失敗的思考。在前書中，安舟依託法國思想大師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經典理論，認定資本主義社會階級差異的形成，歸根結底源於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文化精英對政治資本、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的長期壟斷，進而指出中國共產黨消除階級差異的行動之所以失敗，是因為中共政權雖然在消除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的壟斷方面成效顯著，但在消除政治資本的壟斷方面遭遇阻力，無功而返③。

在本書中，安舟結合當代中國「單位」制度的興衰，並藉此對一度頗受追捧的「雙重轉型論」（即認定

經濟體制轉變必然帶來政治轉型）提出質疑和挑戰。他強調市場化改革並不必然促成民主化，因為市場化改革從根本上摧毀了「產業公民身份」（industrial citizenship）和「自主權」（autonomy，本書專指「工人自主權」），而這兩者都是實現「工廠民主」（workplace democracy）的必要條件：「資本持續接管愈來愈多的經濟領域，……其擁護者充滿信心地宣稱，經濟領域是民主的禁區。在這種情況下，恢復產業公民身份可能相當渺茫，因為歷史潮流似乎朝着相反方向流動。」（頁235）

《得而復失》一書以當代中國的國營工廠為考察重點。基於對全國各地121名國營工廠退休工人和幹部的訪談，以及一些檔案資料和其他歷史文獻，安舟較為細緻、深入地論述了在單位制度變遷過程中，工人政治行動與工廠權力結構的複雜互動。在他看來，本書議題與全球範圍的市場化浪潮和民主嬗變這些宏大主題緊密相關。本文將簡要概述全書內容，對安舟的相關論述提出一些商榷意見。

## 一 核心概念與理論預設

從章節設置看，全書一共分為九章。第一章是總括性的介紹，簡要評述有關工廠政治的研究現狀，介紹中國案例的特點，展示本書的主要框架。從第二到第八章，作者按照時間線索，追溯了1949年以後數十年間中國工人群體在產業公民身份和自主權上得而復失的過程，以及不同時期工人參與工廠管



安舟是美國「新左派」代表人物之一。（資料圖片）

理的種種具體實踐。在最後一章，安舟將中國案例所揭示的問題放置到全球範圍歷史發展的脈絡中加以重新審視，指出未來工人運動的發展方向。

在時間跨度上，本書內容涵蓋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從各章具體內容看，安舟對中國工人群體在產業公民身份和自主權上得而復失的過程描述，自有其內在的邏輯理路。與此同時，他對不同時期自主權及工廠民主參與限度的多元化、歧異性的闡釋，給人留下深刻印象。書中透過西方概念所呈現的一些重要史實，與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國內的主流歷史敘事相映成趣，有助於拓展與深化我們對這段歷史的現有認知。

本書的分析論述涉及工廠政治的諸多方面，不過始終圍繞着「產業公民身份」、「自主權」、「工廠民主」三個核心概念展開，闡釋了三個概念在中國語境下的現實內涵，以及三者之間的應然關係。源於西方的「產業公民身份」和「自主權」概念，構成其有關中國工廠內部權力關係變化的解釋框架的兩個坐標軸。然後，安舟又將產業公民身份、自主權和工廠民主三者結合論述，將國家、工廠（資方）、工人視為三個既有緊密關聯、又有不同訴求的行為主體。為了更好地理解全書內容的基本脈絡，並對其作出恰如其分的學術批評，我們有必要梳理安舟借用的這些西方概念的來龍去脈，以及他藉此建構出來的理論預設。

「產業公民身份」是由英國經濟學家斯坦丁（Guy Standing）最早

提出的一個概念，用以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幾十年來工人階級社會地位的顯著提升，即「工廠就業不僅保障了經濟性權利，也帶來了政治性的權利義務」；「工廠民主」指的是「工人高度組織化，有些加入自主創建的工會，有些則加入僱主或國家創建的組織。工人也被政黨動員參與國家政治」。不過在安舟看來，這兩個概念所揭示的歷史發展進程並非始於二戰結束之後。他認為自十九世紀後期工業化以來，世界範圍內曾經湧現過三次爭取產業公民身份和工廠民主的浪潮。在此期間，工人通過組建工會組織來增強自身的抗爭實力，最終獲得了產業公民身份，但工廠民主的目標卻始終沒有實現。進入1980年代後，第三次工廠民主浪潮在更為強勁的市場化浪潮衝擊下逐漸消解，工人逐步從產業公民淪為隨時可能被解僱的僱傭勞動者，工廠民主更是無從談起（頁2-4）。

安舟據此推論，產業公民身份只是實現工廠民主的基礎條件，自主權才是工廠民主能否真正實現的關鍵所在。按照安舟的解釋，「自主權」概念的意涵，具體表現為不同層次的獨立行動能力。最低層次的自主權，是指每個工人有權對自己職責範圍內的事情發表意見，實現自我管理；最高層次的自主權，則是指工人有權採取集體行動，促使工廠管理層改變政策。不同層次的自主權，在集體化程度、政治化程度和抗爭強度等方面存在着明顯差異。與此同時，自主權的大小還取決於工廠管理層對言論自由和集體行動的容忍限度（頁11）。

安舟推論產業公民身份只是實現工廠民主的基礎條件，自主權才是工廠民主能否真正實現的關鍵所在。不同層次的自主權，在集體化程度、政治化程度和抗爭強度等方面存在着明顯差異。

中國工人群體在產業公民身份和自主權上的得而復失，大致經歷了三個歷史階段。第一階段大致從中共建政到「三大改造」完成。第二階段大致從三大改造完成到改革開放之前。第三階段是改革開放以後。

安舟關於「產業公民身份」和「自主權」的概念闡釋，旨在強調它們對工廠內部關係的決定性影響。他還按照這兩大因素的強弱程度，給出了一個工廠內部政治關係的四分式模型：一、家長制（強產業公民身份和弱自主權）；二、市場專制（弱產業公民身份和弱自主權）；三、個人自主（弱產業公民身份和強自主權）；四、工廠民主（強產業公民身份和強自主權）（頁13）。在他看來，家長制是毛時代中國工廠內部權力關係的表現（頁81）。

按照安舟的解釋，在踐行社會主義制度的中國，工人與工廠之間存在着一種長期穩定的僱傭關係。一方面，單位制度與戶口登記、糧食配給、福利供給、勞務派遣等制度相互勾連，使得個人流動受到嚴格控制，工人不能任意轉崗或到其他地方工作；但另一方面，工廠管理層也不能隨意開除工人。在安舟看來，長期就業保障、良好生活條件和一定程度的政治參與等，構成中國工人群體產業公民身份的實質性要件（頁9）。換言之，在社會主義管理模式下，工人雖然不是工廠的所有者，但作為法定利益攸關方，他們獲得了產業公民身份，並被賦予某些法定權利和義務。

不過，安舟也指出社會主義國家的工廠管理制度具有四大基本特徵：「第一，它們通過建立強大的工業社區，培養了工作場所中的公民規範；第二，它們使這些社區成為國家治理和民眾參與的中心點；第三，它們採取激進的措施來平抑現有的社會不平等；第四，它們始

終保持着某種形態的政治壟斷。」（頁8）這些基本特徵——尤其是第四個特徵——意味着社會主義國家的自主權實際上微乎其微。以1949年以後的中國為例，在高度一元化的政治體制下，中共在各工廠成立民主管理機構，壟斷工廠內部權力，禁止自發性組織的建立。儘管毛澤東幾番嘗試借助群眾運動釋放工人的自主權，但實際效果極為有限。安舟由此得出的一個重要結論是，中國的工廠民主目標始終難以實現，主要癥結在於自主權的缺失（頁8-9）。

我們認為，上述基於概念闡釋和理論演繹的解釋框架，既是本書的一大鮮明特色，也是書中一些史實鋪陳歧義紛呈、甚至自相矛盾的癥結所在（下詳）。

## 二 整體結構與主要內容

按照本書分章，中國工人群體在產業公民身份和自主權上的得而復失，大致經歷了三個歷史階段。第一階段（第二至三章）大致從中共建政到「三大改造」（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期間由於國家與工人在反對官僚主義、買辦資本和私營工廠主的鬥爭中利益趨同，國家頒布了一系列法令法規，賦予工人各種合法權益（包括產業公民身份和自主權）。作者着重探討中共政權如何將眾多國營和私營工廠改造為社會主義國家特有的「單位」，以及這種新的制度建構如何賦予工人產業公民身份和自主權。



第二階段(第四至六章)大致從三大改造完成到改革開放之前。期間由於國家取代了資方在經濟生產中的角色，與工人之間存在利益衝突，儘管國家在輿論宣傳中依然強調保護工人利益，但在工廠管理實踐中工人的權利受到很大限制。作者關注工人成為產業公民後如何以個體或集體方式參與工廠管理，追求工廠民主，尤其是在「四清運動」和文化大革命期間，他們如何在毛澤東的支持下，為擴大自主權與工廠管理層激烈對抗。

第三階段(第七至八章)是改革開放以後。期間受到全球範圍工廠民主退潮和資本主義復興的影響，中國政府大力支持工廠管理層進行管理體制和產權體制改革，工人此前獲得的各種權益完全喪失。安舟尤其重點考察了後毛時代受到政府鼓勵的工廠經營管理體制改革如何導致產業公民身份和自主權的喪失，以及隨之而來的工人任人宰割的悲慘境遇。

### (一) 工人獲得自主權階段

1949年中共建政後面臨的重要問題之一，是如何實現對國民經濟和生產實體的控制。第二章提到，為了贏得工人的擁護，新政權大力支持工人向資本家爭取權利的鬥爭。與此同時，由於顯而易見的共同利益，工人也樂意與新政權合作。結果是幾年以後，資本家的權力壟斷遭到徹底顛覆，工人的權益得到前所未有的擴展，國家則實現了對經濟和生產的完全控制。在接管和改造舊工廠的過程中，中共新

政權向工廠派出少量黨員幹部(通常是農民出身的解放軍老兵)，發動群眾進行車間自我管理，在工人中發展黨員、建立基層黨組織，並建立了廠一級的工會和職工代表大會。少數政治表現好、工作能力強的工人被任命為班組長、車間主任乃至廠領導班子成員。

與此同時，如第三章所指出，隨着工廠的單位化，工人普遍地獲得了以終身僱傭制(國營企業中的「固定工人」)為顯著象徵的產業公民身份，勞動報酬和其他福利待遇也得到極大改善。不過安舟也注意到，儘管工人得到了「鐵飯碗」，並經常參加廠內各種會議，但所有政治議程和群眾參與方式都由黨領導下的工廠管理層決定，任何獨立的政治活動都會遭到禁止。儘管工人名義上有權參與車間管理和監督幹部瀆職的行為，但實際上他們很難表達不同意見，或以獨立方式採取集體行動。這種家長制的權力關係結構顯然無助於實現工廠民主。

### (二) 自主權受到限制階段

在三大改造完成以後，國家完全取代了資方在工廠中的角色，必然與工人發生利益衝突。因而在第二階段，於工廠管理的實際運作中，國家政策幾度左右搖擺，試圖在培育自主權和維護國家利益之間達成某種平衡。工人與工廠管理層的對抗與衝突，在四清運動和文革期間達到高潮。

按照安舟在第四章的解釋，1950年代以來旨在反對工廠管理層官僚主義的群眾運動一直收效甚

隨着工廠的單位化，工人普遍地獲得了以終身僱傭制為顯著象徵的產業公民身份。儘管工人名義上有權參與車間管理和監督幹部瀆職的行為，但實際上他們很難表達不同意見，或以獨立方式採取集體行動。

文革結束後，舊的工廠管理體制全面復辟，自主權再度名存實亡。隨着改革的逐步深入，尤其是進入到減員增效階段，工人的法定權益面臨嚴重威脅。1990年代初，很多工人在失去工作的同時也失去了產業公民身份。

微，主要問題在於工人無法自主地批評、監督領導幹部（即工人缺乏自主權）。為了改變這種狀況，毛澤東在1963年發動了針對中下層幹部的四清運動。鑒於1957年「鳴放」運動失控的歷史教訓，毛澤東希望在這次運動中做到上級黨委領導與基層群眾運動相結合。因而在四清運動期間，上級主管部門和地方黨委向工廠派出工作組，發動工人檢舉揭發幹部的官僚主義和特權腐敗問題，並對問題嚴重的幹部加以公開批鬥和組織處理。由於這場運動沒有從根本上觸及黨的一元化領導體制，工廠的運動始終處於工作組控制之下，條條框框很多，工人顧慮重重，參與熱情不高。因此，儘管這場運動在打擊幹部腐敗和經濟犯罪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幹部階層的特殊地位並無實質性的改變。毛澤東對這樣的結果大為不滿，決定發動更加激進的文革，賦予「革命群眾」（包含工人階級）更大的自主權。

第五章的文革敘事脫胎於陳舊的「三年文革說」，即認為文革到1969年中共九大已結束，強調文革時期幹群矛盾和群眾衝擊領導的特性<sup>④</sup>。在安舟看來，文革是一場獨立於各級黨組織、自主性很強的群眾運動。期間工人成立造反派群眾組織，挑戰黨在工廠中的領導權威，實現了不受約束的政治參與。後來隨着群眾組織的不斷發展壯大，工人還發起廠內奪權行動。昔日頤指氣使的幹部被趕下台，基層黨組織陷入癱瘓。但奪權後造反派陣營內部爆發了激烈的派系鬥爭，令毛澤東大失所望。他並未將工廠的管

理權交給群眾組織，而是要求建立革命委員會作為新的權力機構。儘管革委會按照「三結合」原則組建，成員包括老幹部代表、群眾組織代表和參加「支左」工作的軍隊代表，但軍隊幹部在其中發揮着主導作用，自主權實際上受到嚴格限制。

文革結束後，舊的工廠管理體制全面復辟，自主權再度名存實亡。在第六章中，安舟對此總結道：「毛為延續其革命事業而採用的策略，是在激進份子和行政官僚之間進行分工，結果被證明是極其脆弱的。儘管這種微妙的制衡結構在多年動亂中得以延續，但因為它完全依賴毛的個人權威，所以無法在毛去世後繼續存在。」（頁165）安舟明確指出，四清運動和文革期間聲勢浩大、高潮迭起的民眾政治參與，並非群眾自主地採取集體行動的產物，而是響應毛澤東號召的結果，而且始終有賴於毛個人權威的加持。這無疑抓住了歷史現象的本質。

### （三）自主權喪失階段

按照安舟於第七章的敘述，改革開放初期的經濟體制改革僅限於加強勞動紀律、提高勞動效率，並未觸及公有制和終身僱傭制這兩個單位制度的特色。而且在文革之後的撥亂反正中，工廠職工代表大會等制度性參與形式也得到恢復，自主權至少在形式上得到加強，所以工人並不反對改革。

然而隨着改革的逐步深入，尤其是進入到減員增效階段，工人的法定權益面臨嚴重威脅。第八章談

到，很多工廠的工人團結起來抵制改革，與工廠管理層發生激烈衝突。但由於改革得到國家的支持，工人的抵制猶如以卵擊石。臨時工數量的增加和廠長權力的不斷加強，導致以單位制度為依託的產業公民身份開始遭到侵蝕。1990年代初開始的產業結構調整和產權制度改革，使得絕大多數國營和集體工廠變成由管理層控股的股份制公司，終身僱傭制被短期合同制或更不穩定的臨時僱傭關係取代，很多工人在失去工作的同時也失去了產業公民身份。

### 三 實證性分析論述

總體而言，在第一和第三階段的論述中，由於國家、工廠和工人三方的利益關係格局較為明確，安舟的理論闡釋較為清晰順暢，案例分析也比較符合實際情況。但在第二階段的論述中，因為政府存在「一身二任」問題（既是國營工廠的後台老闆，又是勞動糾紛的仲裁者），加上安舟對中共高層政治和社會基層情況缺乏深入了解，所以很多重要論點似是而非。更糟糕的是，他為了保持其論述體系的邏輯自洽，對一些重要問題含糊其辭，甚至避而不談。這必然導致其歷史敘事的片面性。

在第二階段，安舟對毛澤東在文革期間的複雜表現，以及毛的態度變化對群眾運動走勢的決定性影響，似乎知之甚少。在他的敘述中，毛似乎是一個獨立於黨的存在。在黨與工人之間，毛似乎義無

反顧地站在工人一邊。由於本書並未就毛的政治理念作出較為詳實的闡釋，也未涉及中共內部的領導方式和組織原則，讀者難免會提出以下一些疑問：自主權在中共政權穩固以後一直受到嚴格限制，難道與毛的治國理政思想無關？作為中共領袖，如果毛從一開始就反對限制自主權，那麼那些限制性制度還能夠建立嗎？如果毛一開始並不反對限制自主權，那麼又是哪些因素促成毛的立場轉變？

談到毛澤東在文革期間的複雜表現，群眾性造反運動的蓬勃興起固然與毛的「大民主」號召有密切關係（頁99-101），但群眾運動的敗落與消亡也是毛乾綱獨斷的結果。在1967年初群眾組織奪權以後，各地駐軍迅速對工廠實行軍管；1968年「大聯合」期間要求群眾組織自動解散，並以武力威脅為後盾；在「三結合」的革委會中，群眾組織代表僅具象徵意義；1969年中共九大以後重建各級黨委，恢復黨的一元化領導體制；1970年代初「清查五一六」運動期間，很多原造反派頭頭遭到審查、監禁；1972年以後中央命令軍隊幹部歸隊，地方黨政大權落入曾被打倒的老幹部手中。凡此種種措施，無一不是出於毛的決策<sup>⑤</sup>。安舟的文革敘事只提毛鼓動群眾造反的壯舉，不提毛限制、剝奪自主權的舉措，顯然與實際情況相去甚遠。

事實上，如果要說文革期間的群眾運動確實存在着某些自主權，也僅限於1966年下半年至1967年初這段時間，隨之而來的軍管已經宣告了自主權的終結。此外，儘管

在第二階段的論述中，因為政府存在「一身二任」問題（既是國營工廠的後台老闆，又是勞動糾紛的仲裁者），加上安舟對中共高層政治和社會基層情況缺乏深入了解，所以很多重要論點似是而非。

安舟斷言市場化改革對於工廠民主的影響是直接且負面的。這個論斷符合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實際情況。然而安舟似乎沒有意識到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並不完全是全球範圍資本主義復興的產物，而是有着強大的、本土化的內在邏輯。

革委會作為一種過渡性權力機構一直延續到1980年代初，但群眾組織代表自始至終徒有虛名、有職無權。隨着中共九大以後各級黨委重建，權力進一步集中到擔任革委會主要負責人的軍隊幹部手中。很多造反派頭頭由於不是黨員，完全被排斥在新的黨政權力體系之外。1971年「林彪事件」以後軍隊幹部逐步退出地方事務，取而代之的是復出的老幹部。在1974年「批林批孔」運動和1976年「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期間，一些原造反派頭頭謀求恢復「大聯合」時取得的象徵性地位，最後也以失敗告終<sup>⑥</sup>。所以安舟說「這種微妙的制衡結構在多年動亂中得以延續」，實在莫名其妙。

大量歷史證據表明，毛時代中國工人的權益實際上僅限於所謂「產業公民身份」。而且這種身份的實質性內涵也僅限於經濟層面，主要是終身就業保障。對於工廠管理和國家政治，工人基本上無緣置喙。文革期間造反派頭頭曾經風雲一時，但很快就為其短暫的輝煌付出了慘重代價。工人階級的政治領導地位，自始至終名實難副。

在第三階段，安舟通過追蹤中國工人群體在產業公民身份和自主權上的變遷，斷言市場化改革對於工廠民主的影響是直接且負面的。這個論斷符合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實際情況，值得引起學界同仁的重視與反思。然而從本書的論述也可以看出，安舟似乎沒有意識到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並不完全是全球範圍資本主義復興的產物，而是有着強大的、本土化的內在邏輯。我們

認為，中國改革開放的根本動力，在於長期實行的以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為基本特徵的蘇聯模式問題成堆、難以為繼。國營工廠的昔日輝煌，並非源於蘇聯模式的制度優越性，而是源於國家政策傾斜與各種資源壟斷。安舟極為看重的國營工廠工人的產業公民身份，以及基於這種特定身份所獲得的優厚的工資待遇和其他福利，是以犧牲佔人口絕大多數的中國農民和非正式工人（如臨時工、合同工）的各項合法權益為代價的。如果說國營工廠工人的產業公民身份得而復失是一件令人遺憾的事情，那麼廣大農民和非正式工人從來沒有享受過同等待遇，豈不是中國社會主義實踐中更大的遺憾？本書論述框架和歷史敘事的片面性、狹隘性和自相矛盾，以此為最。

#### 四 整體評價

《得而復失》呈現了「新左派」對政治行動中個人自由的關注和對工廠權力關係的思考。安舟試圖通過解剖中國案例，為一個全球性的問題提供答案。他對一些西方概念的引介，以及基於這些概念所提出的理論解釋框架，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現有認知體系的理論維度。本書關於1949年以來中國工廠內部權力關係發展演變的一些史實呈現，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國家、工廠和工人三者之間的複雜關係，豐富了我們的歷史知識。他斷言經濟改革並不必然帶來雙重轉型，符合中國近四十年來的實際情況，必然



促使學界同仁對市場化改革與民主化的關係問題作出更加深入廣泛的研究和思考。

但本書的不足之處也顯而易見：第一，安舟似乎將自己視為工人階級代言人，其「新左派」立場統攝了全書的論述。這樣的觀念預設必然影響到其歷史敘事的客觀性，進而影響到本書的學術價值。

第二，全書的論述體系以三個西方概念及其相互關係為核心。這些西方概念與中國實際情況之間的關聯性主要基於安舟所作的理論闡釋，多少給人牽強附會之感。

第三，儘管安舟試圖在書中展現工廠政治與國家政治的內在關聯性，但由於他對毛澤東的政治觀念和中共組織原則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所以很多論斷似是而非，有時還自相矛盾。他對毛時代中國政治的理解和闡釋，主要來源於晚年毛的講話。他顯然沒有意識到，大躍進失敗以後毛的很多講話實際上旨在自我辯護，推卸責任，維護其英明神武形象。毛幾次發動反對官僚主義的群眾運動，並非因為他真的在意群眾權益，而是因為他的錯誤決策和文過飾非態度在黨內高層引發信任危機。

第四，安舟關於工廠制度和工人權利的論述，主要基於官方文件和主流報刊社論。他並未意識到「文本制度」和「基層實作」有時是完全不同的兩碼事。在談到不同時期工廠和工人情況時，他主要依據訪談資料和廠史資料，在一定程度上呈現了基層情況的多樣性和複雜性，但這樣的多樣性和複雜性並沒有使他的論述體系變得更加多元和更加

厚重，因為他只在其論述體系中吸納了那些符合其觀念預設的事實。

總體看來，本書的敘述內容在相當程度上拓展與深化了我們對當代中國國營工廠管理體制歷史變遷的現有認知，但令我們印象更為深刻的，卻是作者對「新左派」政治理想和主張的理論性闡釋。

### 註釋

① Joel Andreas, *Rise of the Red Engineer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Origins of China's New Clas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安舟著，何大明譯：《紅色工程師的崛起：清華大學與中國技術官僚階級的起源》（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7）。

② “Levenson Prize”，<https://web.archive.org/web/20211204025929/https://www.asianstudies.org/grants-awards/book-prizes/levenson-prize>。

③ 安舟：《紅色工程師的崛起》，頁12-15。

④ 印紅標：〈文革歷史概說〉，《華夏文摘增刊》，第1178期（2019年6月11日），[www.cnd.org/cr/ZK19/cr1010.gb.html#1](http://www.cnd.org/cr/ZK19/cr1010.gb.html#1)。

⑤ 卜偉華：《「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頁725-89；董國強：〈派性身份、個人處境與政治抉擇：從地方視角反思文化大革命〉，《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14年6月號，頁48。

⑥ 董國強：〈派性身份、個人處境與政治抉擇〉，頁44-54。

儘管安舟試圖在書中展現工廠政治與國家政治的內在關聯性，但由於他對毛澤東的政治觀念和中共組織原則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所以很多論斷似是而非，有時還自相矛盾。

柯孜凝 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碩士研究生

董國強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